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研简报

2018年第2期（总第50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8年12月5日

本期要目

➤ 特别报道

王邦佐先生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我院郑磊副教授获得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后期资助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2018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立项资助

我院赵剑治博士获2018年度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领域重点项目立项资助

复旦大学政治学高峰学科9项课题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

- 成果简介·专著 (P6)
- 成果简介·论文 (P11)
 - 国际政治系 (P11)
 - 政治学系 (P20)
 - 公共行政系 (P28)

特别报道

王邦佐先生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 贡献奖

11月14日，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2018）学术年会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我院王邦佐先生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性阐释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作出的突出性贡献”而喜获学术贡献奖，这是我院继陈其人先生后再次获得这一奖项。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

日前，经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审议通过，607项申报成果拟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学术贡献奖4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125项、学科学术奖438项、决策咨询与社会服务奖40项。

我校政治学高峰学科群有30项成果获奖，分别为：学术贡献奖1项，中特一等奖2项，中特二等奖5项，学科学术一等奖7项，学科学术二等奖12项，决策咨询与社会服务奖3项，其中，我院获奖20项（包括2项公共管理）。

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序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专家	获奖名称
1	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王邦佐	学术贡献奖
2	武器级勒索软件偷袭暴露我国网络防御致命缺陷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沈逸	决策咨询与社会服务奖
3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	左才	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一等奖
4	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	陈玉刚，秦倩	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二等奖
5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徐以骅 等	学科学术奖著作类二等奖

6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 问题意识	陈明明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一等奖
7	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陈周旺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一等奖
8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 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	苏长和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一等奖
9	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	唐世平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一等奖
10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 再分配效应	张平 等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一等奖
11	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学 ——乔万尼·萨托利的主要著述 及其学术贡献	包刚升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12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ragile World Order (中国、 欧盟和脆弱的世界秩序)	陈志敏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13	How does democracy influence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民主如何 影响民众的腐败感知？一项跨国比 较研究)	李辉 等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14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 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 政治效应	刘建军 等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15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 动	潘忠岐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16	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制度“陷阱”	郑宇	学科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17	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 构	陈志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文 类一等奖

18	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李辉 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类二等奖
19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刘建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类二等奖
20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唐莉 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类二等奖

我院郑磊副教授获得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后期资助

日前，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我院郑磊副教授获得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后期资助，其项目名称为：中国政府数据开放研究。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 2018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立项资助

日前，经组织专家会议和面谈比选两轮评审，2018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项目已立项公布。我院唐亚林教授的《全上海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实现路径研究》课题获得该项目立项资助。

我院赵剑治博士获 2018 年度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领域重点项目立项资助

日前，经专家严格评审，上海市 2018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领域重点项目已立项公布。我院赵剑治博士的《全球城市与国际科技组织合作的国际经验与上海策略》课题获得该项目立项资助。

复旦大学政治学高峰学科 9 项课题获得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立项资助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按照规定程序，顺利完成评审立项工作并于 6 月 5 日公示。复旦大学政治学高峰学科有 9 项科研项目入选，包括 5 项一般项目与 4 项青年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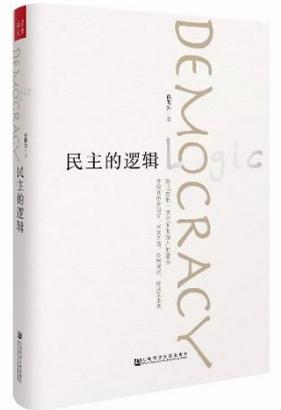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所在学科
贪污贿赂类职务犯罪的大数据分析	李辉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政治学
西方福利国家理论前沿追踪研究	刘春荣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政治学
高校高层次海归人才引进成效的后评估研究	唐莉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研究	蔡翠红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宗教格局变化及中国应对战略研究	涂怡超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对非援助创新与非洲国家发展自主性研究	姜璐	复旦大学	青年项目	政治学
战后琉球法律地位研究	李超	复旦大学	青年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天主教与近代法国殖民大国兴衰研究 (1660-1960)	谢子卿	复旦大学	青年项目	宗教学
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的演化机制实证与发展对策研究	于迎	复旦大学	青年项目	管理学

➤ 成果简介·专著

民主的逻辑

包刚升 专著

本书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底、大量的历史经验，试图解答下列问题：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问题引起的大论战已经持续了 2500 年，仍未尘埃落定。今天，民主在全球范围内似乎迎来新一轮衰败，对民主政体的悲观论调也越来越流行，盖过了此前对民主普遍看好的声音。在西方发达国家，移民问题正考验着民主的边界；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治理的运行不畅让民主踌躇不前。民主的未来是否危机重重？本书具体从六个方面展开：从古至今思想史上的民主论战、现代民主如何起源、民主政体如何扩散到全球、民主兴衰的主要原因、怎样理解民主治理的绩效、民主的未来前景如何。借助这本书可以思考：该如何清晰地认识民主？人类的政治生活该往何处去？



反腐败：中国的实践-复旦政治学评论

陈明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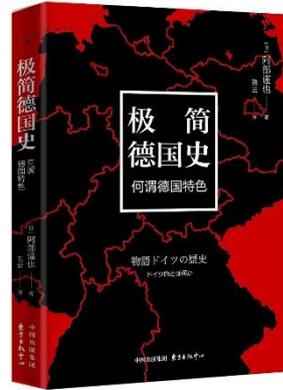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持续掀起强大的反腐败浪潮，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转型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过程分析腐败发生的根源，探寻如何有效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陈明明主编的《反腐败——中国的实践/复旦政治学评论》以国际、国内反腐败实践为背景和线索，对改革过程中资本和权力关系（政商关系）做深度分析，在理论上揭示腐败发生的条件和特点，总结中国反腐败的经验，为建构遏制腐败的制度、文化和健康的社会生态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言。



极简德国史：何谓德国特色

陈云 译著

本书纵深把握了德意志国家体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力剖析了近现代德国的荣光与挫折背后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对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城市、工匠制度和音乐史等的分析，独到地呈现了德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敏锐地把握到了德意志人的社会和精神特质。本书由作者积数十年研究经验而写成，学术视野广阔，叙述深入浅出，既对专家学者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也适合大众读者深入了解德国历史。



《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

洪涛 专著

斯威夫特是近代英国著名讽刺小说与政论文作家，《格列佛游记》是他受欢迎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这部作品只是被视作一部奇谈之作，其真正价值未被充分认识和了解。本书是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以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和小说的真正意义。对《格列佛游记》的阐释离不开它所诞生的原始语境——刚建立的英国现代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争。本书认为《格列佛游记》是古今论战的产物，也是对现代国家行反省式思考的早作品之一。



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黄河 合著

苏珊·斯特兰奇曾指出，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已经成了“核心的组织者”，成了世界经济活动的“增长引擎”。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地位，确定了其具有影响全球治理结构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本书主要研究了跨国公司作为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活动的，以及跨国公司与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法与宗教非政府组织

秦倩 专著

本书从国际法合法性角度思索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检视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律领域的行动、影响及其限度，而后反观国际法的合法性何以可能及宗教对国际法远景的建构意义。



国际关系精要（第七版）

潘忠岐 译著

本书对国际政治的基础话题和基本概念进行了精练、透彻的阐释，并因此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它不偏不倚地介绍了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它为学生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上理解世界政治事务提供了全面的分析工具。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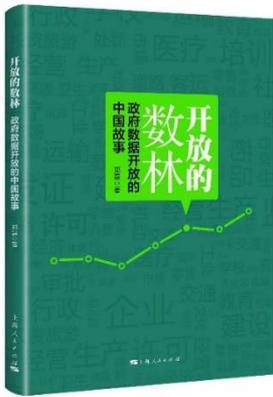
熊易寒 著作外译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随志愿者还乡这两个戏剧性事件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1）早期生活经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据此可以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2）“农民工子女”不是 identity 意义上的身份，而是 status 意义上的身份；（3）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产出来，充满建构性和不确定性；（4）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开放的数林：政府数据开放的中国故事

郑磊 专著



政府开放数据的中国故事很纠结：一方面都知道开放数据利国利民，一方面又生怕开放数据后给自己惹来麻烦；一方面都希望别人能开放数据，一方面又想着把自己的数据藏起来；一方面都在谈数据价值无限，一方面又在为清理数据里的“垃圾”而头疼。等到数据终于开放了，又担心别人不来用，又担心别人来“乱”用。本书就来谈谈有关政府数据开放的问题：为什么政府应该开放数据？会带来哪些好处？又有哪些风险？哪些数据应该开放？哪些又不应该开放？怎样才是开放数据的正确姿势？政府数据开放这件事和哪些人和组织有关？还存在哪些问题？开放政府数据为什么这么难？未来路在何方？本书基于大量一手资料，第一次系统讲述了政府数据开放的中国故事，希望能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者、实践者和关注者，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界的读者们，提供一本集理论梳理、实践解读和路径指南于一体的参考读物。

公共行政的改革、创新与现代化

竺乾威 专著



本书既涉及对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改革、创新和现代化的分析，又涉及对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的讨论，还包括对公共行政学这一学科的理论探究。全书共六编：体制改革与政府创新；官僚制度与政策过程；政府组织的变革与发展；重塑国家—社会—市场关系；公共行政现代化的挑战；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本书是竺乾威教授从事学术研究数十年来的部分成果之集合，亦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献礼，收录本书中的论文部分体现出中国行政体制的发展特征，有些甚至对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本书适合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相关专业学者、师生阅读，也适合广大国家公职人员阅读。

发展政治学

曾庆捷 专著



发展政治学，或称政治发展研究，关注的是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政治问题。本书介绍了发展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并详细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民主化与民主倒退、发展中国家的政体类型、族群矛盾、政教关系、殖民主义遗产和国际影响等发展政治学中的重大问题。书中吸纳了近年来最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各类理论问题，着重介绍了一些实证研究的发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本书有助于读者

对这些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较深入的了解。本书每章章末还配有“名词解释”与“思考题”，便于初步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把握相关知识要点；本书附录“发展政治学前沿研究指南”更是一幅学科地图，为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状况的人士提供学术前沿成果介绍；本书还有配套课件供授课教师申领使用。本书适合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使用，也适合广大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状况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国际政治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全球性挑战的应对

陈玉聃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CSSCI）2018年第5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其本质而言，全球性挑战指向人们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的生存和进步这一人类社会的根本主题。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前提、以共享共赢为核心诉求、以人类进步为终极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当今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之下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指引。全球性挑战的诸多议题复杂并相互交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顶层设计”可以为全球性挑战提供议题的界定和综合性的治理。

21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陈玉聃副教授

访谈

陈玉聃

《国际政治研究》（CSSCI）2018年第4期

国际政治一向被视作以权力、利益为核心的领域，与强调感性、追求美的艺术格格不入。实际上，艺术作为观念的反映，始终在表达和建构国际政治。自21世纪初“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口号提出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这一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国际学界关于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现状如何？中国学者取得怎样的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韩善聪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授。陈玉聃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艺术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思想史，著有《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等。

“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黄河

《太平洋学报》(CSSCI) 2018 年第 8 期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需的巨大缺口及“私物化”倾向日益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欧美各国自顾不暇并逐渐减少公共产品供给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日益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一带一路”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者。我们可以把服务于“一带一路”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时代崇高而值得追求的战略目标,那么提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就是在新时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其重要的步骤。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品。

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与国际法:挑战与应对

黄以天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21 辑)(CSSCI) 2018 年 1 月

气候友好型的技术转让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气候治理,同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规范这些技术转让具体实施的相关全球气候法律框架需要改进,以便为技术转让提供更多的支持。着眼于分析在全球层面克服法律障碍的路径,本文首先回顾了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和技术转让科学性的共识,然后讨论了现在的全球气候法律框架下的一般原则和技术细节,并通过对中国技术转让案例的研究,探讨了中国作为受援国在实施技术转让方面的优势和问题,同时以高铁和农业技术为例初步分析了中国作为技术输出国面临的挑战。在结论中,本文还对全球法律框架的相关不足之处进行了讨论,提出几个有助于在当前全球气候法律框架下用来克服法律障碍的方案。

Multi-level governance: Explaining the”climate-focused”behavior of Chinese exporting companies

黄以天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SSCI) 2018 年 6 月

While being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climate-friendly business strategies, Chinese exporting companies have been active in taking “climate-related” actions but moderate in taking “climate-focused” action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apply multi-level governance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exporting companies towar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convergence of state-centered climate politics and market-oriented climate governance, which has a multi-level feature, has shaped the “climate-focused” behavior of Chinese exporting companies. Specifically, nation-stat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contribu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at the global level, nation-states co-established and interpreted international norms, which generally justify the s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an indirect source of influence; (2)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actor, which has put emphasis on energy-saving when interpreting and oper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norms; (3)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influential contributors by playing a proactive role in launching and running low-carbon initiatives; and (4) trans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launched in China and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offered limited momentum.

Diplomatic Opportunities and Rising Threats: The Expanding Rol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李安风(Andrea Ghisell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SCI) 2018 年第 112 期

Through the lens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significant impact that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as had ov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Over tim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as changed from being understood as an opportunity to boost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o being seen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within security threats. China’s security and diplomatic behavior has changed accordingly. In particular, China has become more confident in using and authorizing force. This article pinpoints this process started in the 1990s by looking at the debate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al, institutional and military response against those new threats. It also prompt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drivers an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neral approach of studying the same subject.

Revising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Contemporary Cherry-Picking of Ancient Strategic Thought

李安风 (Andrea Ghiselli)

《China Quarterly》 (SSCI) 2018 年 3 月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military thinkers, especially Sunzi, i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oday to shed light on a critical aspect of Alastair Iain Johnston's work on strategic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eign policy elites and the cultural artefacts and symbols at the origin of strategic cultur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olves around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Chinese military scholars and officers between 1992 and early 2016 in the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journal, China Military Scienc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ome elements of Chinese ancient military thought are readily apparent in China's military doctrine and operations today. These elements clearly call for a realist vision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within the PLA. Yet, the analysis also prompts reflection on how to positively engage China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国际造法：中国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参与

秦倩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 21 辑) (CSSCI) 2018 年 1 月

自国际局势日渐趋向多极化以来,国际法的法典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无疑更具有意义。自 1949 年国际法委员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规定成立后,一直在国际法发展与编纂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法治大国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尽管已经在一些国际造法实践中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仍应在国际法规则的酝酿、国际习惯法的形成等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本文选择国际法委员会为切入点,通过分析 1971 年以来委员会历任中国籍委员的背景、学术观点及中国具体参与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情况,探讨中国参与国际造法的实践情况。

网络空间的攻防平衡与网络威慑的构建

沈逸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 2018年2月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领域。网络空间的军事化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客观趋势。目前关于网络攻防、网络威慑及其对大国战略稳定影响的讨论存在不足。一部分观点认为,归因、划线、对称报复等技术困境的存在使得网络威慑难以成立。而网络攻防失衡、进攻更占优势的结果将打破战略稳定,并导致频繁的网络战争,甚至引发冲突升级。然而,这种怀疑论和悲观论实际上模糊了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事件之间的界限,又未能全面理解网络攻防之间存在的巧妙平衡。通过对特定网络攻防技术进行区分,再结合对于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经验分析,不难发现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后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归因问题也并非无法化解。由此一来,“向谁报复”“在何种情况下报复”以及“如何报复”这三大困扰网络威慑的问题也基本上迎刃而解。以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务实对待和理解网络空间的攻防均衡,通过构建积极的网络威慑实现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在当下已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也应该成为大国在网络空间战略互动的一个主要方向。

China an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s)

唐世平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SSCI) 2018年第1期

In this essay I survey the key themes within China's discourse on international order, especially how China views its position and role in shaping the existing and future order. I go on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thinking and actions towar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 conclude that overall, China sees no need for and hence does not seek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but rather piecemeal mod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order. In fact, China has been quite content with the existing order that supports globalization, despite occasional rhetoric indicating otherwise. In the near future, China will likely invest heavily in two key issue areas: (1)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and (2)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erhaps unsurprisingly, China's ambitiou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seeks to integrate these two issue areas.

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

唐世平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2018年5月

在最简约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只有三类客体(研究对象),它们分别是观念、行动和结果。未能理解这三类客体在本体论层面的差异以及解释它们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这一事实,是造成很多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显得内容贫乏的核心原因。因此,明确区分这三类客体,并理解解释它们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的事实,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这一讨论对社会科学的教​​学也有重要的价值。比如,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认识论的折中主义”越来越流行,而作者的分析表明,这种认识论的折中主义是误导性的。尽管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是万能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认识论都是一样的。某些认识论立场对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任务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今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都要求学生至少掌握一种方法,甚至更多。大家似乎都认为,这些方法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作者的分析表明这一假定也是错误的。因此,对于研究生们所面对的“时间太少和要学的知识太多”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作者的分析给他们提供了选择方法的基础。

族群冲突研究:历程、现状与趋势

唐世平

《欧洲研究》（CSSCI）2018年1月

过去40年来,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其首要的研究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条件下,更容易出现族群冲突或和平?本文将2012年前的研究分为四个波次,据此批判性考察其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进展。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而言,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在理论层面上,该领域早已超越了三大范式的辩论(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义),形成了新共识,即研究需要从三大范式和其他路径中抽取有效的元素来加以整合。此外,新制度主义已经(再次)崛起为该领域内一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在实证层面上,在诸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日益精致的方法和技术以及更多、更好的可用数据集的联合推动下,学界对族群冲突原因的探索不但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收获了更为深入、更加丰富的知识。随后,本文着重介绍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研究,它们整合了理论和实证,代表了未来优秀研究的方向;同时指出了当前研究还存在精细化甚至有些碎片化的两种趋势。最后,文章在方法、数据和研究议题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若干可能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唐世平

《John Wiley & Sons Ltd.》（SSCI 通讯作者）2018 年

Bringing together the classic defense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growth, we propose a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that identifies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pting economic growth. We contend that the channel of liberty-to-innovation is the most critical channel in which democracy holds a unique advantage over autocracy in promoting growth, especially during the stage of growth via innovation. Our theory thus predicts that democracy holds a positive but indirect effect upon growth via the channel of liberty-to-innovation, condition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then present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our theory. To our best knowledge, we are the first to propose such an indirect and conditional effect of democracy up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ystematic evidence. Our study promises to integrate and reconcile many seemingly unrelated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theories and evidence regarding regime and growth, including providing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inconclusive results from regressing overall regime score against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or change in level of GDP per capita.

大国宗教（代序）

徐以骅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 16 辑）（CSSCI）2018 年 1 月

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近年来我国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沟通和交流是宗教的天然属性。由于宗教作为我国民间交流载体的特殊性，我们既不必将国家外事功能过多地赋予我国宗教，也无需对我国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活动作泛公共外交的解读。随着我国宗教法治化和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宗教软硬件水准以及宗教的社会认知度和受尊重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徐以骅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7辑）（CSSCI）2018年10月

“大国学术”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本文试从“大国学术”的高标准出发,讨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

中国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分析

张骥

《国际展望》（CSSCI）2018年5月

外交安全智库是一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行为体。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是分析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的两个维度。从权力资源的维度看,智库拥有政策供给、理论供给、人才供给、平台供给与舆论供给五种资源;从权力运用的维度看,智库通过影响本国决策、影响他国决策、塑造国际议程三种方式来提升其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安全智库迅猛发展,但中国外交决策需求与智库供给间存在需求—供给差,智库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尚不明显。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根本上要推动研究议程的转型升级,满足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对政策供给和理论供给的需要;推动组织形态和研究方式变革,提升政学交流、人才供给水平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对话平台,提升舆论供给特别是国际舆论供给能力。

朝核问题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

张建新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7第21辑）（CSSCI）2018年1月

朝鲜不放弃核武化的立场和越来越频繁的导弹发射活动,使美朝、美韩关系长期陷入紧张对峙与有限对话的循环状态。现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定义了美国对朝政策,其核心可概括为“最强有力的施压与干预”。然而,朝鲜核武化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其政权安全,任何单边施压与干预政策恐怕都难以奏效,反而有可能触发战争引信。根据以往处理朝核危机的经验来看,如果各方在给予朝鲜安全承诺的基础上,以双边、多边会谈的形式,确定弃核的时间表和核查程序,则有可能取得预期成果。为此,特朗普政府必须确立清晰的政策目标。或许美国需要严肃考虑中国政府提出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思路。

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选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朱进杰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2018年8月

作为新兴经济体倡议筹建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承载着推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变革运营制度的使命，但金砖银行采用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不同的借款国导向运营模式，而亚投行采用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类似的股东国导向运营模式。为解释这一差异，作者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出发，借鉴关键节点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反馈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中，本文在探讨促使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成立的关键节点和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利用银行筹建谈判中各种制度方案相互竞争的反馈效应因素，来解释两者在运营制度上的差异。在金砖银行的筹建谈判中，中国对印度倡议的反馈效应使得平分股权成为金砖银行制度运营的基础，并在环境与社会等保障政策上充分尊重借款国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借款国导向模式。而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针对中国提出的制度倡议，发达国家做出了亚投行缺乏多边性和不符合国际最佳标准的负面反馈效应，这使得中国高度关注亚投行的国际合法性，从而形成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类似的股东国导向运营模式。

政治学系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包刚升

《政治学研究》(CSSCI) 2018 年 3 月

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这种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实际上,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这里的悖论在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的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但如果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群体和部分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国家形成政治认同,不能对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过来削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等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选举、治理与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对上海近郊某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的观察

陈周旺

《河北学刊》(CSSCI) 2018 年 2 月

选举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基层选举由于行政介入而常流于形式。尽管如此,中国基层选举依然维持了高投票率。其原因不仅在于政治效能感或者高效的选举动员,更应虑及人口结构变动导致组织化矛盾而引发的投票动机。本文通过对 2012 年上海近郊邢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选举的投票率高,并不是因为选民关心治理,而是通过投票来垄断投票权。本文的结论是,在组织化的迫切要求下,那些原本流于形式的选举,就越发引起重视,越容易出现高投票率,也越有利于上级组织意图的实现。

十年家国梦：198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街头媒介为中心的考察

陈周旺

《新闻记者》(CSSCI) 2018年3月

1980年代之前中国只有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兴起,恰是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最重要的契机。由正式机构主导的民族主义,与民间市场力量结合,共同助推了民族主义的形成。通俗文学、连环画和流行音乐等出版物的发行推广,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结合,从中可以透析出,在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之处,民族主义是如何通过民间社会文化网络进行传播而蔚然成风的。

患寡更患不均：不公平感如何影响民众对腐败与反腐败的认知

李辉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8辑)(CSSCI) 2017年12月第一版

本文考察社会不公平感与民众的腐败感知及其对反腐败的看法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和腐败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社会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民众的社会不公感和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对两者关系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会显著影响他们对腐败和反腐败的看法。具体来说,民众不公平感越强,就越认为腐败较严重,其反腐败满意度也就越低。本文进而讨论这一发现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贪污受贿案涉案金额的结构特征——基于司法判决书数据的初步分析

李辉

《复旦学报》(CSSCI) 2018年第5期

本文聚焦的研究问题是:在腐败市场上,权力是如何定价的?腐败金额反映了贪官在腐败市场上获取利益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行贿者购买权力所要支付的成本,对于理解中国的腐败的现状极为重要。在腐败市场理论背景下,基于一个全新的司法判决书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腐败类型、腐败案件所在地区、贪官的行政级别和职务、贪官所在部门的管辖领域对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都有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在今天的中国,贪官通过受贿获得的利益要大于贪污;权力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在上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涉案金额要高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权力的价格还取决于其支配资源的大小,因此,贪官的行政级别越高,平均涉案金额也越高;从管辖领域来说,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涉案金额最高,其他领域差别不大。

民国江南城镇的市政建设及其局限

林涓

《浙江社会科学》(CSSCI) 2018年1月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与城镇管理一直处在调整变革之中。在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新式的市政建设正在逐步展开,也是现代化的必要趋势。其具体内容,除公共交通道路、桥梁、驳岸、下水道的建设外,还涉及路灯、供水、环境绿化、清洁管理等公用事业。繁杂的市政建设的主要目标,在经济、交通、卫生与美观四大方面,集中体现于道路建设、饮用水与排水、卫生清洁与夜间照明。通过不同城镇建设情况的宏观考察与具体差异分析,可以对民国时期城镇的主要变化、发展态势以及行政管理等形成基本认识,从而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城镇的基本存在形态。总体上新式的市政建设要求与现实的城镇生活处境,还不能得到有效的配合,江南城镇间经济发展与工业文明的差异在当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市政建设存在着局限性。

关于国际政治研究中三个基础性问题的思考

桑玉成

《国际展望》(CSSCI) 2018年1月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国际政治研究逐渐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中分离,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与趋势,以至于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成为两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畴。考察国际政治的研究缘起与价值取向,可以认为,国际政治的研究与政治学的研究在学科范式、价值取向、关系模式等方面是相互通约的,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分野。甚而至于,国际政治研究需要以政治学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基础为依托。因此,有必要明确政治学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关系。遵从政治学研究构筑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蓝图并付诸实践,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设计优良的组织 and 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的价值取向。统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关系格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利益交织,从研究范式的转换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路径变迁。这无论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还是国际政治的研究,都是值得重视的。

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

桑玉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 2018年2月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政治判断。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硬任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话,那么,致力于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通过切实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

论吏治的伦理基础与道德引领

桑玉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 2018年02期

吏治是理解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和社会兴衰的重要视角,在当代就表现为一套严整的干部管理制度。对于吏治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官员廉政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除此之外,吏治还具有社会道德的引领功能。吏治之所以具有这个功能,就在于官吏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核心,官职的稀缺性则强化了吏治的道德示范作用,而先锋队政党的性质使得干部制度成为引领社会道德发展的重要手段。吏治引领社会道德主要是通过提升官员道德来实现的,以“官德”引领“民德”。这种引领作用的效果有赖于官员道德的制度化程度。

东亚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王正绪

《政治学研究》(CSSCI) 2018年01期

政治参与是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对治理的质量、公众对政体的合法性的感知等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参与的种类很多,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也很复杂。本文利用涵盖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地区)调查数据,对选举类和联系类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比较了不同的政体环境下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并对影响政治参与的经济社会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进行回归模型分析,试图进一步推动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环境、政治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参与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为的一些实证理论。

Becoming a Good Citizen for a Better Life: Why does the Middle Class Prefer Negotiation over Rightful Resistance in Shanghai?

熊易寒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SCI) 2018年02期

'Rightful resistance'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prote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wever, the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is more inclined to protect its rights through 'loyal appealing' than rightful resistance. The middle class has had to express its loyalty and its 'voice' at the same time to minimize its political risk. Rightful resistance and 'loyal appealing' differ in several respects. First, rightful resistance professes loyalty only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reas loyal appealing professes loyalty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Second, rightful resistance considers the local government an object to confront, whereas loyal appealing considers it a potential ally. Finally, activists who engage in rightful resistance use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as their weapon, whereas activists who engage in loyal appealing use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tical performance as a bargaining chip. However, the middle class has not completely relinquished its right to rightful resistance; instead, rightful resistance is a backup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loyal appealing.

直觉与顿悟：知识生产的隐性过程

熊易寒

《公共管理评论》(CSSCI) 2017年12月

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直觉和顿悟对于规律的揭示、概念的发明、机制的发掘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们的研究方法教学和讨论中,人们通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直觉和顿悟的价值。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寻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是知识生产的显性过程,通过直觉与顿悟接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则是知识生产的隐性过程。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但不能成为“唯方法主义者”,以为方法可以直达“真理”的彼岸。在研究方法之外,直觉和顿悟在“知识生产”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

Demolition of Chengzhongcun and social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熊易寒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通讯作者)(SSCI) 2018 年

Since the late 1980s, millions of poor and low-income rural migrant workers migrating to Chinese metropolises with their children have congregated in chengzhongcun (villages in the city) for low-cost housing. Drawing on data from a 14-mont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one chengzhongcun in Beijing, we critically explor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on social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We argue that the uncertainty and chaos connected with looming demolition result in substandard schooling and business closures for migrant parents, leading to the stagnant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Expanding the social hierarchy pyramids, we argue that eliminating chengzhongcun, a space that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climbing the social ladder, hampers the social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gid class structure in the late-socialist China. This research re-examines the goals of the demolition of chengzhongcun and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by analyzing the prospects of disadvantaged migrant youth during and after the demolition process. Since the late 1980s, millions of poor and low-income rural migrant workers migrating to Chinese metropolises with their children have congregated in chengzhongcun (villages in the city) for low-cost housing. Drawing on data from a 14-mont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one chengzhongcun in Beijing, we critically explor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on social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We argue that the uncertainty and chaos connected with looming demolition result in substandard schooling and business closures for migrant parents, leading to the stagnant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Expanding the social hierarchy pyramids, we argue that eliminating chengzhongcun, a space that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climbing the social ladder, hampers the social mobility of migrant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gid class structure in the late-socialist China. This research re-examines the goals of the demolition of chengzhongcun and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by analyzing the prospects of disadvantaged migrant youth during and after the demolition process.

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

曾庆捷

《复旦学报》(CSSCI) 2018 年 1 月

霸权型政党体制是多党选举体制和一党执政的结合,已成为当代最常见的威权体制之一。已有文献对威权国家中执政党和选举的功能有颇多论述,但对于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却很少谈及。本文通过对当代 21 个相关案例的梳理,对该体制的起源模式进行了一个分类学的研究。根据之前存在的政体类型以及导致第一次多党选举召开的政治形势,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可被分为封闭式一党制的自由化改革、民族独立运动引入的多党选举、军人政府推行的政治改革和内战终结后的政治安排四大类。通过结构化的案例比较,本文进一步指出,从封闭式一党制演变而来的霸权型政党体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在封闭式一党制时期执政党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国家资源的控制,会在引入多党竞争之后持续巩固霸权型政党体制的存续。未来的研究必须充分考察该体制的历史起源模式如何影响着之后的政治发展轨迹。

Party Institutions and Authoritarian

Power-Shar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

Appointment

曾庆捷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SCI) 2018 年 02 期

Recent scholarship of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suggests that party institutions contribute to regime resilience by facilitating power-sharing among the party elites and preventing the paramount leaders' abuse of power that undermines political stability. Existing studies tend to focus on the empir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egime resilience, whereas the actual effects of institutions on elite behavior receive less atten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f China's appointment system to examine whether the CCP's power-sharing institutions indeed constrain the personnel authority of the party's paramount leader. Using a unique dataset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appointment from 1992 to 2014,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General Secretary enjoys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constrained supremacy' in the making of personnel decisions: the leader can boost his own position by providing favorable treatment to key supporters, but the formal arrangement of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constrains rampant reward of patronage that would unsettle the balance among the regime's top elites.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lay bare the difficulty of capturing the inner workings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s with broad, cross-national indicators of regime type; they also illustrat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l, personal logic of exercising power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乡村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范式与实践

曾庆捷

《南开学报》(CSSCI) 2018年3月

中国乡村自晚清以来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乡村变迁的主要理论框架是“国家政权建设”范式和“国家与社会”范式。前者认为,现代国家借助官僚机构的扩张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生活,但这种权力扩张是否提升了“现代性”,即它是否建立起了现代的国家公民关系,实现了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依然值得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被引入中国后,学者们开始聚焦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秩序。这些研究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和乡村社会力量相互交融,才能最终触及村民的日常生活。近年来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表明,正是国家权力与乡村非正式规则的融合,才使得整齐划一的、带有刚性的政策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的实际情况。

公共行政系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及其平衡

陈水生

《学术月刊》(CSSCI) 2018年5月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民众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和共建美好生活的重要平台。城市公共空间价值的有效发挥要遵从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逻辑。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遵循三重逻辑: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偏好控制和秩序,通过公共政策实现公正;资本逻辑追逐利润与效率,运用市场机制达致效率;生活逻辑追求宜居和幸福,借助参与机制构建人本空间。这三大逻辑共同决定和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生产与治理绩效。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更多地受到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制约与影响,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失衡与异化。要消解这种异化,让城市公共空间回归其公共性、服务性和宜居性宗旨,城市公共空间生产要更加注重生活逻辑,使得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保持动态平衡,促进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发展,创造美好城市生活。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陈水生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CSSCI) 2018年5月

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而多元的功能,是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公共参与的重要平台以及城市活力和多元生活的重要源泉。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存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和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三种典型模式。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就导致公共空间治理遭遇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迷失、治理边界与治理责任的模糊,治理技术与治理价值的张力三重治理困境。为此,要从树立民本、服务和宜居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和加快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创造美好城市生活。

Dual Ident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ontracting in Shanghai

敬义嘉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SCI) 2018 年 27 卷

Chinese governments, driven by both pragmatic and legitimacy purposes, have been enthusiastically engag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ervice contracting to meet rising service deman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ontracting is shaped by their dual identity as state agents and social actors. Such a dual identity is forged by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nal tension may create both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for contracting.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for the social service program in Shanghai (2009–2013), the article finds intriguing evidence that both identities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participated to demonstrate loyalty and manage their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 as well as to seek new resources, social vi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apacities. They reconciled the two identities by adopting multiple strategi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how contracting has been adapted to the social-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China.

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效率：基于公共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敬义嘉

《公共行政评论》(CSSCI) 2018 年 03 期

购买服务是我国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创新。政府由此必须经常在“制造还是购买”之间进行选择，其决策质量将深刻影响购买服务政策的效果。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购买服务的前提是政府在服务的生产和交易环节获取比较经济效率。论文从公共服务的公共属性出发，认为在权衡购买服务的比较经济效率时，必须纳入对服务公共性治理的制度效率。为检验扩展的比较效率分析框架，论文对我国 22 个省 41 个市县的 756 名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研。研究发现，公共性治理效率会显著影响公务员对购买服务的态度，同时当前购买服务的整体效率还比较有限。研究认为，用公共性视角来补充和完善购买服务的市场化视角，能够深化和拓宽对政府效率、核心竞争力及其制度基础的理解，辅助政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购买决策。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敬义嘉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SCI) 2018 年

In the West, limited government capacity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s triggered the rise of a variety of “nonstate actors” to supplement government efforts or provide alternative mechanisms for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How does this development - along with our efforts to understand it - map on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cesses in China? China's effort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reflect institutionalized governance processes that differ from parallel western processes in ways that have major consequences for domest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going abroad.” China's governance processes blu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other actors; the “shadow of the state” is a major factor in all effort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space occupied by nonstate actors in western systems is occupied by shiye danwei (“public service units”), she hui tuanti (“social associations”) and e-platforms, all of which have close links to the state.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NGO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also significant players in China. As a result, the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that produce effects in China differ in important ways from mechanisms familiar from the western experience. This conclusion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ose seeking to addr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growing economy and burgeoning network of trade relationships.

公共责任与“四风”治理

李瑞昌

《中国行政管理》(CSSCI) 2018 年 02 期

“四风”不仅是科层组织自身携带的不良遗传基因,而且是科层组织与社会相互适应、孪生寄生的肉瘤。从公共责任视角来看,“四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责任分离,间接原因却是履责激励极化,直接原因则是责任感下降。治理“四风”不仅要让公职人员知晓客观责任、明白主观责任、履行客观责任、尽心主观责任,而且要对他们进行责任效果考评、责任错误问处,还要完善以惩罚为主的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以奖赏为要的正向激励机制、重建以声誉为重的终向激励机制,从而建成制度问责、绩效问责和人民问责的问责体系,确保科层组织健康地运行。

从联防联控到综合施策：大气污染政府间协作治理模式演进

李瑞昌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CSSCI) 2018年03期

大气污染由大气污染物、大气污染源、大气污染过程和大气污染后果等部分构成。大气污染具有污染源多元性、存量累积性、移动无界性和负外部性等社会特征,因此,治理大气污染既要靠科技,又要靠管理,更需要政府间协作。大气污染治理政府间协作经历了区域内联防联控模式,正在向区域间综合施策模式演进。具体表现为:科技发展从环保科技向绿色科技迈进,协作基础从属地管理向区域协同演化,协作目标从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向存量减除转变,协作方式从行政方式向市场方式调整,协作主导者从地方政府主导向中央政府主导发展。

新中国调解制度变化的内容、路径、动力及未来

李瑞昌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 2018年8月

社会治理制度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社会治理制度之一的新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从单位体制向司法体制的转变,正在走向社团体制。理解新中国调解制度的变化成为反思和预测调解制度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认为,要理解新中国调解制度变化,既需要从微观层面知晓制度变化的内容,更需要从宏观层面知道制度变化的动力。通过建构制度内外部动力推动社会治理制度选择和影响定分止争的工具变革的逻辑框架,本文发现:在社会治理制度选择的内外部动力驱动下,新中国调解制度发生了意识、规则和组织创新的变化,实现了调解体制的三次变迁,不断地提高了制度的效能。其中,社会矛盾变化、治国理政理念调整和科学技术变革是外部动力,而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变革是内部动力。

理解邻避冲突中政府回应的差异化模式：基于城市治理的视角

孙小逸

《中国行政管理》(CSSCI) 2018 年 08 期

现有文献大多采取冲突一维稳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对邻避冲突的事件性回应。这种研究视角忽略了冲突事件所处的城市治理环境,不能解释为何地方政府对邻避冲突存在事件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这两种不同的回应模式。从城市治理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冲突回应研究应当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城市治理框架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不同政府回应模式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政府回应邻避冲突的解释框架。一方面,邻避议题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程度构成政府回应策略选择的目标动力,另一方面,地方治理网络的开放程度、政府制度吸纳能力构成政府回应策略选择的制约因素。本文最后提出政府应对邻避冲突的政策建议。

Infrastructural Power and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 The 1980s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Committees in Shanghai

孙小逸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SSCI) 2018 年 16 期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pacity of China to adapt in the face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reforms, and argues that the regime's resilience lies in the state's capacity to establish infrastructural power at the urban grass-roots level. The 1980s was an invaluable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witnessed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 Chinese state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adapt to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As the danwei (work unit) system weakened, the state rebuilt the logistical infrastructure by means of handling burning issues, accumulating resources for expanding welfare coverage, facilitating residential-based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networks, and consolidating its power through building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urban governance.

Spatial Meaning-making and Urban Activism: Two Tales of Anti-PX Protests in Urban China

孙小逸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SSCI) 2018 年

Urban spa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meaning-making process in relation to urban activism, especially for disorganized, spontaneous, and short-lived protests occurring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aking protests against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LULU) project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urban space shapes the meaning-making process in relation to 2 anti-paraxylene (PX) protests in Kunming and Maom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resident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azards of PX shaped the meaning-making process on social media. In the case of Kunming,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the primary frame employed by residents wa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risks. In the case of Maoming, a large petrochemical industrial center with severe air pollution, residents expressed their opposition toward the PX project by emphasizing strong dis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Participants' differentiated meaning-making processes were shaped by the dual space of cities, namely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associated meanings and place-bounded historical memories of daily lif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scholarship on c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of space/place and the theory of framing to analyze the spatial meaning-making process in relation to urban activism in China and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in general. Article ahead-of-print.

Retraction and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 in China

唐莉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SSCI) 2018 年

This article draws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 managers and policy makers to the issue that to become a science power curtailng misconduct is the daunting challenge that emerging countries simply cannot ignore. Systematic and orchestrated efforts are needed to foster and institutionalize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 among all stakeholders.

Long live the scientists: Tracking the scientific fame of great minds in physics

唐莉

《Journal of Informetricss》(SSCI) 2018 年

This study utilizes global digitalized books and articles to examine the scientific fa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ysicists.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greatest minds are gone but not forgotten. Their scientific impacts on human history have persisted for centuries. We also find evidence in support of own-group fame preference, i.e., that the scientists have greater reputation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or among scholars sharing the same languages. We argue that, when applied appropriately, Google Books and Ngram Viewer can serve as promising tools for altmetrics, provi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impacts schola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made beyond academia.

Retraction and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 in China

唐莉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SSCI) 2018 年

This article draws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 managers and policy makers to the issue that to become a science power curtailng misconduct is the daunting challenge that emerging countries simply cannot ignore. Systematic and orchestrated efforts are needed to foster and institutionalize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 among all stakeholders.

Missing author address information in Web of Science-An explorative study

唐莉

《Journal of Informetrics》(SSCI) 2018 年

Bibliometric analysis is increasingly used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research performance across geographical regions. However, the problem of missing information from author addresses has not attracted 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his study probes the missing data problem in the three core journal citation databases of Web of Science (WoS).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from 1900 to 2015 over one-fifth of the publications indexed in WoS have completely miss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address field. The magnitude of the problem varies greatly among time periods, citation databases, document types, and publishing languages. The problem is especially serious for research in the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published before the early 1970s and remains significant for recent publication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Further examinations suggest that many records with completely missing address information do not represent scholarly research. Full-text scanning of a random sample reveals that about 40% of the missing address articles have some address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indexed in WoS.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problem of partially missing address information for U.S. research has diminished dramatically since 1998. The paper ends by providing some discussion and tentative remedies.

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定位与地方治理转型

张平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CSSCI) 2018 年 02 期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地方财政改革的缘起与落脚点,在地方财政体系和政府治理的整体架构中探讨房地产税的定位。在中国地方财政体系的建构中,税制结构优化、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和公共服务供给等三个方面均证实了房地产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充分性上,房地产税将是财产税的最主要税种,亦是最可能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潜在税种;从必要性上,房地产税改革是要达到改善政府治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势在必行的一步。房地产税作为以受益税为特征的高效率地方税种,可以成为财权与事权匹配的天然工具,形成地方财政收支相连的治理体系。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体的特殊性,房地产税改革的制度设计需要遵循地方自主、差异税率和渐进改革的思路。

新兴援助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治理结构研究：基于部分金砖国家的比较分析

赵剑治

《中国行政管理》(CSSCI) 2018 年 02 期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发展援助成为我国公共治理的新兴领域。文章运用“整体性治理”视角,形成分析对外援助治理结构的初步理论框架,对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对外援助治理结构进行系统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和印度的整合性援助机构较好地将援助的政策和实施功能结合起来,在内部运行机制上表现更好;巴西则在援助纲领构建和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的援助治理结构应进一步强化整合性援助机构的职能,形成对外援助的纲领性文件,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数据跟踪与监测评估体系。

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及其援助战略分析——基于欧美的比较视角

赵剑治

《当代亚太》(CSSCI) 2018 年 2 月

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的比较和演进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样重要的是对不同路径选取背后的战略考量。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迅速增加,如何借鉴他国经验和教训来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正变得日益重要。日本的对外援助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因为其在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上的长期巨大体量,更在于其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范畴属于西方阵营,却具有不同于欧美且相对独立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因而日本对外援助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文章基于日本近 60 年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框架,对日本二战后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进行了翔实的数据分析。文章认为,日本对外援助数据显示出其具有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其 1954 年加入“科伦坡计划”以来经历的探索发展期、谋求政治大国期、独立风格成型期高度契合。文章通过探讨其不断演进背后的战略考量,有助于理解日本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动态路径演变及其背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开放不等于公开、共享和交易：政府数据开放与相近概念的 界定与辨析

郑磊

《南京社会科学》(CSSCI) 2018 年 9 月

政府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数据共享、数据交易等概念在实践和研究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存在不少误区。准确地理解政府数据开放,梳理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正本清源,推动真正的政府数据开放。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外文献资料,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标准进行了总结,然后对政府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的联系与区别;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共享、政府数据产品等相近概念之间的异同等进行了辨析和探讨。

明诺布鲁克三次会议与公共行政研究的演进

竺乾威

《中国行政管理》(CSSCI) 2018 年 05 期

明诺布鲁克三次会议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影响了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走向,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明诺布鲁克会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些特点。所有这些可以给我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比较的观点

竺乾威

《学海》(CSSCI) 2018 年 1 月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自主性有关,其话语体系表现了一种多种学科综合、多种理论兼收并蓄的特点。美国公共管理话语本土化的建构在于它不断适应公众的直接需要,在于它领先的问题意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常态化的学术批评与争论。我国公共管理话语本土化的建构具有一个相对较好的文化基础,这一建构需要对话语体系本土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需要有一个包括正确处理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鼓励批评争论、自由探讨等在内的良好的学术环境。

